

0406

应县文史資料

8

政协应县文史資料委员会

应县文史资料

第八辑

应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封面设计

应县文史资料 第八辑

1995年 12月出版

出版：应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应县文史资料》编辑室

地址：县城南三环路

电话：5023130

印刷：应县印刷厂

邮编：037600

应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 张平

委员 马永胜 刘好佐 石稔兆

霍润

EAD8/40

主编 张平

审稿 王耀政

目 录

- 1959年的高征购及大收大购 杨林 (1)
1960年在阳高大泉山的饥饿 杨林 (3)
1954年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 杨林 (5)
北曹山乡五十年代种植水稻 杨林 (8)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杨林 (10)
1958年的浮夸风 杨林 (12)
1958年的共产风 杨林 (15)
1959年接马峪村遭涝灾 杨林 (17)
- 永生的政治工作员——田淑 石稔兆 (19)
高志昂生平事迹点滴 肖志荣 (23)
郜秉林传略 杨日泉 (29)
杜文礼其人 杨日泉 (30)
赵殿举烈士传略 张振华 (32)
缅怀安北县县长赵殿举 史一洲 (39)
赵殿举烈士二三事 赵柱家 (43)
梁鉴堂传 赵柱家 (45)
名铁匠牛富 牛银才 王耀政 (48)
- 日伪时期修建韩家坊大桥 杨林 (50)
儿童团的故事 鲍恒政 (53)
突围送信脱险记 王金贵 (55)
- 应县的“弥勒会” 张平 赵月顺 (59)

- 罗庄成立联庄与保甲队始末 袁 悅 (60)
杨家窑战斗 王志明 (67)
刘慕韩挺身访日寇 龙泉村幸免遭祸灾 赵晋权 (71)
徐有为除奸 王志明 (74)
应县境内有经六个朝代修筑的古长城 杜忠 张富 (79)
赵彻组织土匪队伍始末 王志明 (80)
应县古歌谣十首 赵晋权 (86)
“割蛋”是怎回事 杨日泉 (90)
县城四次火灾纪略 丁 福 (93)
插队生活琐忆 孙振兴 (97)
桑干河漫忆 杨 林 (106)

文史考证

- 《金瓶梅》词话方言新证 马永顺 姚力葵 (109)
独霸应昌的乔日成 (第一篇) 康耀先 (124)

合作化史料

- 忆合作化 (174)

一九五九年的高征购及大收大购

○ 杨 林

一九五九年应县全县遭受涝灾，粮食大减产。但是秋收后，征购粮食时晋北地区刮起了“左云之风”。晋北地委副书记李鹏飞同志带工作组去左云县坐镇收粮，他主观武断，决意在左云县收购一千七百万斤粮食，而且雷厉风行，很快收起了粮食一千七百万斤。收起粮食后，又写文章表扬左云县人民的高尚风格，要求全区人民学习。实际情况如何呢？据亲自参加左云县粮食征购的同志们说，当时把群众的口粮、籽种都收了。事后左云县县委的同志敢于讲真话，要求地委解决群众的口粮和籽种。至一九六〇年六月已返还粮食一千八百万斤；胜利度过了灾荒。

“左云之风”刮到应县后，在应县座镇的地委工作组长杨凤泉同志和李鹏飞同志一样，积极推行“左云之风”；决心在应县收购三千多万斤粮食。当时各公社的负责同志都说，遭灾减产完不成任务，但都受到了批评，说思想右倾。点名批评的是义井公社书记吴鸿山同志，当时的县委主要负责人，在“左云之风”的压力下，也只好附和地委工作组的意见，使“左云之风”刮到了各公社。用强行手段收购，至十二月底如数完成了任务。其中有一部分是就地入库。为何就地入库呢？因为当时各个粮库已放满了粮食。原因之一是无粮可交，报个就地入库的数字也算完成任务。当时我在接马峪村蹲点，公社分配征购任务是六十多万斤，实际交了三

十万斤就没粮了，后来报了就地入库粮三十万斤，也算完成了任务。实际上三十万斤粮食也是群众的口粮，大灾之年那里有余粮呢。由于征了过头粮，到一九六〇年春就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伴之而来的是大批人员外流。历史经验证明，绝不能收过头粮，一收过头粮就要死人的，就要破坏生产力，这一历史教训非常沉痛。

一九五九年秋冬之际，伴随着粮食的高征购，还有一项大收大购的任务，家畜、家禽、乱铜乱铁统统收购。而且还是“左云之风”在吹，一项任务下来后，当天就要完成，白天完不成，黑夜完成。行政命令不行，就强迫命令，强迫命令不行，就组织基层干部强制收购。我在接马峪村时南河种基层社布置收购肉鸡。老鸡子收完后，还未完成任务，村干部黑夜进社员家从鸡窝捉小鸡，一夜之间捉回三、四百只小鸡。连夜宰杀，退光退净，留下鸡腿，全部上交，临明时村干部把鸡腿熬了一大锅，众人吃了。同时给我送去一大碗，我也吃了，群众反映很坏。有的说，小鸡正在长，长大收不行吗？有的说与日本鬼子进院捉鸡子，有什么两样？有的不敢说，大哭一场，收购乱铜乱铁时，也是硬任务，那有那么多乱铜乱铁呢？没办法只好收能使用的小农具，甚至把社员最喜爱的铜瓢、铜勺也收走了，群众又是一阵叫骂声，那时的村干部最难当，完不成任务上级骂，完成任务群众骂，回了家家人骂。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群众的积极性本来就不高了，五九年再一搞粮食高征购，以及大收大购，群众的积极性就更低了。到六〇年农业生产更遭了，大减产，六〇年大减产，当时上级说是天灾（旱灾），但更主要的是人祸，人的积极性不高，这又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啊！

一九六〇年在阳高大泉山的饥饿

○ 杨 林

一九六〇年六月我被调到中共晋北（忻县地委与雁北地委合并称晋北）地委农工部工作，七月三十一日跟随地委副书记李鹏飞同志去阳高县大泉山公社搞农村调查，开始是地委工作组，有十余人，在调查中发现基层领导班子有些问题，有些村庄半数以上的社员外流，问题相当严重，请示地委后，成立了大泉山工作队，又从地直机关抽一百多人，在全公社普遍搞调查，在调查中又发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基层班子不纯，后来又调去一百多人，在大泉山周围三个公社同时展开农村调查，工作队共有二百四十多人，先开始的三个月工作队用自己的粮票从公共食堂打饭，尚能吃饱，十月份，李鹏飞书记强调与社员同住同吃，社员每天每人从食堂打四两五钱粗粮的饭，工作队也从食堂打四两五钱粗粮的饭，社员回家还有别的补充，工作队员只能吃四两五钱的饭，进十一月份，工作队员有二百多人得了浮肿病，十一月底有九十多人病的不能坚持工作，这时李书记正在太原开会，留在大泉山工作队主持工作的徐继祥同志、周志仁同志向专署专员郑浩同志作了汇报，郑专员感到问题严重，连夜给省委办公厅汇报了情况。后经省委研究决定，让大泉山工作队回阳高县城休息半个月，每人每日保证吃到一斤粮，半斤肉，恢复身体。但浮肿病不是半个月可以养好的，在休息时，阳

县高委书记王进同志给讲了一次话，其中有一句话说：“每人每天半斤粮，只是保命粮，国家给我们每人每日八两粮票，在农村的工作队员可以按国家的标准吃”。这话工作队员太感谢了，当场拍手叫好。休息后，又回到工作岗位，但当时地委规定，大泉山工作队为养好浮肿病，只能白天工作半天，下午五时后一律休息，谁要再工作，谁就作检查。这样坚持到六一年的一月份，春节前工作队全部撤回，当时我在大白登村任工作组组长，大白登村是公社所在地，工作队的办公室和工作队领导人都在公社，监督很严。我们工作组七人，每天只能吃四两五钱粮的饭，早晨是一两玉米面的糁粥，中午是三两玉米面的窝头，或三两面的山药蛋，即一斤半山药蛋。晚上只剩下五钱粮，只能喝稀水糊糊了，四两五钱粮吃不饱怎么办？饿的实在没办法，队员们顾不得纪律了，开始队员们每天去场院抓两把玉米，大约有二两多，然后到地里生吃，后来场院没粮了，又想了几种办法：一是去小白登滩捞虾米，每人捞回一担，回家后用水洗净，用锅一炒就能吃，吃了十来天。二是四百户屯村有人卖盐葛籽面，五角钱一斤，每人买了五斤，但咸的不能吃，都拿回家中作了纪念品。三是从粮站买了十斤黄豆、八十斤谷糠，做成糠炒面，糠炒面倒也能吃，饥了吃上一把，我们每人分了六斤，吃了二十多天。四是公社房上有伙房放的一千多斤大葱，每天黑夜偷上一把，拿回住处烧的吃，烧葱甜而不辣，比较好吃，可惜时间太短，公社发现没了葱，就把余下的放在了库房，偷不上了。五是买兔子吃，大白登打猎的不少，每天有卖兔子的，隔两三天七个人买两只兔子吃，改善改善

（下转第7页）

一九五四年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

○ 杨林

全国解放以后，一九五三年七月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是逐户逐人进行的，对于流动人口，采取了相应措施，防止重登和漏登。因此，这次人口普查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普查，为一九五四年的普选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五四年基层政权的普选工作，是全国性的民主选举工作。基层政权，即乡和行政村的领导人员，依选举法选举，在选举的过程中，既充分发扬民主，又严格依法办事，一切言行都必须符合法律，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所当选的基层政权领导人员均体现了绝大多数选民的意志。

为了把基层政权选好，县里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并下设办公室和检查组，指导各乡的选举工作。抽调党政机关干部组成普选工作组，并经过严格培训，分赴各乡进行工作。当时全县有六十一个乡，分批进行。我是普选工作组长之一，第一批被分配在教场乡进行普选，工作组由我和刘元、任梅兰三人组成，我们三人都年轻，二十多岁的新干部，没有经验。但我们学习认真，基本掌握了选举法的精神。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因此，普选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教场乡是个小乡，四个行政村——教场、茹越口、南上寨、观口前，

: 5 :

全乡不过三千人口。当时区委和区公所还未撤销，我们在区委和区公所直接领导下工作。

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我们紧紧掌握三条原则：即从始至终把宣传工作放在第一位，使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选民懂得普选工作的重大意义，从始至终严格依法办事，一切行动都不得违背选举法；从始至终充分发扬民主，选民登记，选举办法，领导人选等都经民主讨论决定，那时因为是第一次普选，人们对选民证非常重视，领到选民证之后，都按重要证件精心保管。发选民证者都是人民，不发选民证者均系地、富、反、坏。登记选民，发选民证都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一出问题就是违法。和我们同时搞选举工作的张宏恩、周日有二同志，在安营乡刘庄村因在发选民证中，对一名有历史问题的人言语不当，致使该有历史问题的人自杀身亡。因此，张宏恩、周日有二同志均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张宏恩被判一年半，周日有被判刑三年）。

选举工作，第一步是宣传发动群众。第二步是进行选民登记。第三步是酝酿村主任、副主任及出席乡的乡代表。第四步是正式选举村主任、副主任及乡代表，全体选民参加，无记名投票。第五步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乡长、副乡长及乡人民委员会，四个行政村的村主任、副主任及乡长、副乡长都选上了广大选民信任的好干部。他们所得选票均占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从他们得票数就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选民是拥护的。乡代表数额，是按选民多少分配到村，全乡共五十多人，组成乡人民代表大会。乡人民代表大会，是乡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切重大问题都经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教场乡的普选工作比较顺利，第二批又到康辛庄乡搞选举，工作组成员有变化，也是三人。康辛庄乡包括康辛庄、师家坊、张家坊、郑庄四个村，康辛庄、师家坊、郑庄三村比较顺利，唯有张家坊村酝酿村主任、副主任时出现了分歧，意见很不一致。最后乡总支和工作组共同研究决定，双方提出的候选人都称候选人，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按得票多少决定当选。选举结果是以得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候选人当选。选举结束后，广大选民都说，这才叫民主，人民真正当了家，作了主人。

(上接第4页)生活，尽管犯了群众纪律，想了很多办法，七个人还浮肿了三对半。每天拖着病体工作，那时虽然饿着肚子工作，但人们相信毛主席，相信共产党，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因此，人心还是比较稳定的，二百四十多名队员除重病号住院治疗外，无一人掉队，组织纪律性很强。

北曹山乡五十年代种植水稻

○ 楊 林

我于一九五七年春由团县委调往北曹山乡任乡党委书记。当时北曹山乡有九个行政村，经逐村了解情况，得知有六个村种植水稻，年种植有五百余亩（亩产量二百斤上下）。米质优良和繁峙县稻米相同。其中：王宜庄村一百多亩，北曹山村二百多亩，中曹山、南曹山两村各一百多亩，清凉庄村四十多亩，常庄村十多亩。所以能够种植水稻是因为当时地面水较多，东有兰家河（源头在王宜庄村东），约有0.3立方米的常年水，经北曹山、大穗稔等村流入河黄水。西有西大沟，源头在王宜庄村西，清凉庄和常庄村东，约有0.2立方米的常年水，经南曹山、中曹山、上甘港等村流入黄水河。清凉庄村西也有一条大沟，约有0.1立方米水源，也是常年流水，经常庄、周家地二村流入洪河湾，这些水源都是由于三九年雨量较多，由南部山区压出来的，当时王宜庄村人称水晶宫，我有点不信，五七年四月我亲自去王宜庄了解情况，一进村满街都是流水，中午吃派饭时，一进社员的院就是用木料搭的天桥，人从桥上走才能进入住房，房内当地挖一大坑，放一铁锅，锅内盛着由家地渗出的水，渗满一锅后用水桶倒出院内，流出门外，顺街流出村外。再看炉坑，也是经常满坑的水，不时用瓢勺盛于当地的锅内。经问主人他们说，我们村的后半村都这个样子，每年的二月到四月都

是在这水晶宫住着，房子每隔三、五年就得整修一次，我这才相信了王宜庄水晶宫之称。

北曹山乡水潭虽然较多，但解放前没有水利设施，不能全部利用。一九五六年国家扶持在兰家河中段修了水库，能存水两万多立方米。北曹山村水稻面积，由不足百亩，增加到二百多亩，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全乡又建了八个小水库，把地面水全部蓄起来。一九五八年水稻面积曾增加到七百多亩，亩产到二百五多斤。但到六十年代，由于雨量较少，特别是王宜庄村南打了机井群，抽水灌溉，地面水逐年减少，种植水稻面积也自然减少。到七十年代，除王宜庄、北曹山种植几十亩外，其中村庄都不能种了，水减少到什么程度呢，用王宜庄村当村的一口井足以说明问题。王宜庄村中央有一口老井，一九五七年水位和地面保持平衡，人们担水不用斗子盛，在井台上把水桶放下一压就是一桶水。到七十年代，人们担水得用一丈长的斗绳，往上拔水。到八十年代，这口井春冬两季还有点水，夏秋两季就干枯了，现在已成了一口麻井。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 楠 林

一九五七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无疑是正确的。当时确有少数右派分子趁我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大有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势。不反击右派，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能巩固。问题是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扩大化。就我县的反右派斗争来说，也是扩大化。一九五七年我在基层工作，没有参加县里的反右派斗争，当时是什么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从始至终参加一九七九年的改正右派工作。一九五七年划定的五十七名右派分子的材料，我都看过，各单位调查核实的材料，我都听过或看过。根据核实的材料，经县委改正右派领导组研究，五十七名右派分子改正五十六名，只留张子清一人报地委统战部审批。经地委统战部研究后，张子清也作了改正。这是明显地扩大化。为什么扩大化呢？通过各单位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得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当时的县委领导及其办事机构（整风办公室）对中央的文件精神吃的不透，政策界限不很清楚。

二是当时各级干部普遍存在左的思想，看问题有偏激情绪，宁左勿右。

三是对下边情况吃的不透。各单位鸣放的情况，掌握不准。

四是定案时缺乏具体分析。从改正右派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那个单位的领导弱一些，群众的意见强一些，因而划定的右派就多一些，如当时的税务局就是这样。当时群众主要是对年老领导有些意见，但这些意见都按反对党的领导处理。其次是那个单位领导作风不民主，群众意见也多一些，划定的右派自然也不少。如应县中学、卫生科等单位就是这样，应县中学当时有些年轻教员看不惯校长的作风，提了些意见，学校领导硬把这些青年教师按反党集团来处理。有的划成右派分子，有的移送法院判刑，造成最大的冤案。第三是小教中反右，有的凭印象出发，谁有点历史问题，认为谁就是右派。有的任务观点，好象打不出右派就没有成绩。东辉耀村小教张伟同志，就说了一句三百六十斤粮不够吃，就划了右派。第四是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多些，他们看不惯小知识分子的骄气，整风中给领导提了些意见，而且有些意见提的根本正确，但由于看不惯他们的骄气，也划成了右派。

从以上情况来看，我们搞任何工作都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待任何问题，都得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否则就要出偏差，对各级领导来说，搞任何一项工作，都得吃透文件精神，吃透下情，否则就要出乱子。